**目 录**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的九个要点 刘炳香**

**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历程及启示 韩振峰**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学科视野下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集成推进 陈 欢**

**【廉洁文化研究】**

**丁士美与廉政文化 包卫兵 程兰芳 徐培华**

**基于文化空间适宜性的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刘世栋**

#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的九个要点

刘炳香

党章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

在党内，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党章保障党员权利、约束党员言行。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百年来，我们党完成了18次党章修改。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其中总纲部分的修改37处，条文部分的修改13处。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了一部堪称“底板”的党章，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均对党章作出修改，同样的，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党的二十大党章也作出相应修改。党章的每一次修改，都反映出我们党对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认识上的深化，都是对党的实践经验的最新总结，体现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最新成果，能够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增写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党章，以此凝聚全党，感召人民，提振信心。

**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相关内容。**增写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党章，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确保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章强调实行正确的集中，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并对党员新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的义务，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以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全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写入党章。**为实现党的初心使命，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跑好自己手中这一棒。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写入党章，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意志和力量，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锐意进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党章，指明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切实可行的正确路径，使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每前进一步都能获得新的动力。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写入党章。**我们党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写入党章，确保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把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写入党章。**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必须由党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来保证其贯彻执行。把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从而确保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培养和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提供强大组织保证。

**把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党章。**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全党的宝贵财富。把它写入党章，使全党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培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与魂，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面对国内发展各种困难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党章，激发起全党实现中国梦的昂扬斗志。

**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把“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写入党章，把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体现到党章中，使之转化为全党共同意志，成为全党的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推动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与党和国家工作战略部署上来，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断以推动发展新业绩，续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纵览二十大党章修改的全部内容，可见其突出特点，一是党章总纲修改与条文修改相统一。条文修改同党章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作适当修改。使党章条文部分的具体规范充分体现和落实总纲部分的定性、定向、定位、定调等原则性内容。如，对党的基层组织、党组两章部分条文进行充实完善等。二是党章修改内容与修改目的相统一。党章全部修改都以有利于维护党章权威，发挥党章作用为原则，保持党章作为党内根本法规的相对稳定性。三是凡党章修改部分都体现全党意志、集中全党智慧。共识是共为的基础。体现全党共识的党章更能得到全党自觉遵守，从而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果。

在党章中，无论是修改而来的还是保持不变的，都统一于解决“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都落脚到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和强大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党能够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神圣使命。

我们要深刻把握党章改、变与不改、不变的规律，把党章的明文规定和贯穿党章始终的原则、精神学深悟透，使之真正成为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成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

**（作者刘炳香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22年12月2日第2版）**

# 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历程及启示

韩振峰

历史周期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权通过兴衰治乱、往复循环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现象。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的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认真总结我们党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历程和经验启示，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对民主政治的艰辛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强调地方组织中的党员必须接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或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2年6月15日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民主政治“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对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民主政治”作出诠释。其后，随着党领导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党对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赞赏，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于是他指示将此文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同年，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接着，他列举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这几次“大的骄傲”而“吃了亏”的教训，进而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和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先生有过几次谈话，有一次他请黄炎培先生谈谈考察延安后的感想，黄炎培深思后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先生指出，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希望能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听后掷地有声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被称为“窑洞对”，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好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鞭策和警示作用。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提醒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同志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由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党内个别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执政条件下来自多方面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开始滑向官僚主义或腐败的泥潭。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他多次强调要大力加强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领导全党适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果断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违法犯罪案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同时要求“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力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站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维度，对事关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党党风建设问题、反腐倡廉问题、民主法治建设问题等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和探索。邓小平同志高度赞同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针对党内部分干部出现贪污腐败现象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不良风气，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如何解决党风不正以及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现象呢？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才能加强民主和健全法治呢？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使之制度化，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思想，都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向全党提出了“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警示。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座谈时便谈到了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对话。2013年6月，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在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后，强调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告诫广大党员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深刻阐释了其对“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重要论断，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从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相结合的高度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宝库。

**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艰辛历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胜法宝。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用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二要始终不渝坚持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的旗帜，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新时代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国民主道路越走越宽广。三要继续健全和完善科学的监督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执纪执法体系，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要坚持不懈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是决定我们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五要始终如一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见，汇集群众智慧，使党的各项决策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作者韩振峰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22年11月23日。**）

学科视野下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集成推进

陈欢

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国家整合的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涉及权力运行、法律、道德、制度、监督约束、思想教育与惩治等要素，用制度集成解决“系统施治”问题，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将制度建设视为管党治党的长久之策、根本之策，从倡廉与反腐、预防与惩治、治本与治标等方面协同发力，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不是单军突进，而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系统集成、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整体推进，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之治、党规之治的政党治理“三不机制”新形态。本文从学科视角探讨全面从严治党的党纪、监察、国法和德治等四种主要方法及有效整合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有效融通全面从严治党良制与善治，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约束权力，将全面从严治党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一、文献梳理及其前沿问题**

十八大以来，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我国进入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期，多种管党治党方法充实了从严治党的内涵，深化了对从严治党的认识，探索了从严治党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学者们为使党内法规跟上时代步伐，进一步彰显党内法规的作用及时跟进，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成为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关注的前沿问题。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从学科化视角审视全面从严治党有以下特点：

1.治理方法不断拓展和丰富，学科规范化研究持续推进，但缺乏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宏观性、全面性和组合性研究。党全面执政之前对从严治党方法多进行单项运行研究，主要体现在组织纪律上，延安整风是用思想方法管党的集中方式。思想教育方法渗透在党的决定、决议、党章、领导的讲话和文章中。学术专著有：晋乾泰《中国共产党纪律学》、郑荣华《中国共产党纪律学》；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拓展至监察（行政）方面，但机构被撤销达27年(1959-1986)。思想主要集中于党的文献和毛泽东著作研究之中。学术专著有：王长铭和李和中《行政监察学原理》等。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方法逐渐丰富，把制度主要看做是国法和党纪，治党的实践路径各有侧重。张广鑫（2002）认为，毛泽东着眼于思想建党，邓小平注重制度建党，江泽民致力于能力建党。张书林（2007）、李强（2011）等认为，胡锦涛强调文化反腐。2014年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后，学术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制度建设视为关键环节。总体上看,现在党内法规在宏观性、全面性和结构性方面还不能很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从不同领域看，党的领导方面制度总体上偏少、偏弱，党的建设方面制度相对多一些、强一些，但党建的各个领域进展快慢不一、质量层次不齐；从各类规范看，实体性规范总体上比较多而且全，但程序性规范还比较笼统，保障性规范还存在一些缺位，此外，制度的系统性、集成性还有差距。有些法规叠床架屋相互打架，容易造成制度效应对冲。

2.四种主要方法确立后，学科研究重点转向融合、衔接和运用等方面，但新时代须强化治理方法各自的边界、职责、作用及其“组合”研究。2018年以来围绕党纪、国法、监察和德治四种全面从严治党方法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学术专著《党纪与国法的对话——违纪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比较分析》等10多本，主要论文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原理探析》等63篇。专著主要从政治学、法学不同视角研究监察治理方法。柯华庆（2018）分析了党章、宪法二元宪治和党规、国家法律二元法治；季珐彦（2019）以比较具体违纪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分来辨析党纪和国法的关系。刘一霖（2022）提出要贯通规纪法，衔接纪法罪。论文成果主要集中在纪法衔接、融合及应用研究中，虞崇胜（2016）认为纪、法是“双笼关虎”，陈明明（2019）指出党纪与国法既存有紧张，亦具可调适性和兼容性，有少数关注道德与纪律、道德与法律结合治理的研究，如何增科（2016）提出控制腐败=约束（国法+德治）-机会（自由裁量权+资源控制权）。郁建兴，任杰（2018）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角度探讨了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深度融合”，认为三者的组合融合模式最多能达到七种。新时代从治理体系和党的建设体系角度看，四种方法的落地要科学构建诸多工作机制和转化环节，强化治理方法各自的边界、职责、作用和“组合”研究。

3.开始涉猎多种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运用的效能问题，但效绩治党思想在学科上尚缺乏统一的定性与定量的纪律标准，客观测评不同方法组合的理论框架、效绩治党的研究还须深化。任建明（2016）认为，纪法共治的状况最终要通过执行结果来检验；朱景文（2019）认为，对党内法规实施的量化评估，有助于考察我国党内法规实施的实际效果；李思学（2020）认为，政党治理主体、机制和价值直接影响政党的治理效能。谢春涛（2021）认为，治理效能会有“乘数效应”，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更要靠制度。柳宝军（2022）认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优势通过5种机制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些从理论上对实施效果提出量化评估，还需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法。国内的全面从严治党研究比较重视理论分析性的研究范式，注重思辨方式，但对量化方法发挥的独特作用关注不够，学科化研究要把握制度存活和评判价值大小的标准。

国外关于从严治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建党思想、列宁治党实践和中共反腐败等方面。前两个方面的学者试图找出中国共产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论来源。国外学者墨宁(MelanieManion)和公婷(Ting Gong)、裴敏欣( Minxin Pei)的研究成果，不仅涵盖国内腐败的定义、特征、成因及腐败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还对中国反腐制度、方式、机理、效果、发展方向以及群众的认同程度等进行分析。对于后一个方面，美国吉尔福德大学教授郭学志(Xuezhi Guo，2014)，对中纪委的组织机构、操作原则、党纪处分规范和标准以及反腐措施和手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认为中纪委在反腐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学者伊莉莎白·奎德(Elizabeth Quade，2007)(英)和卡洛斯·拉米雷斯( Carlos D．Rameriz，2014)（美）绕过因果关系和发生机理的探索，直接用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验证了“反腐运动与经济形势的关系”和“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魏德安（[Andrew Wedeman](https://book.jd.com/writer/Andrew%20Wedeman_1.html" \t "_blank)，2014）（美）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双重悖论”。海外研究偏好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等实证性方法，但存在一味追求“科学化”的倾向和一些重要研究范式的缺失等瑕疵。

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政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这个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国家的力量，强化国家中的政党力量，强化政党中的核心力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和增进国家治理的效能提升。其中，加强廉政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维度。作为一种对行为的约束性安排，制度在整个全面从严治党中起着重要作用。从研究的理论视角而言，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权力监督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是进行综合分析的学科理论，但遗憾的是，这些方法和理论散见于不同学科、文件和部门及地方的配套规定中，2018年党内法规权威论者就指出：“党规理论研究起步不久，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和初级阶段，研究成果数量不足、质量不太高，距离形成成熟的党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从实践上来看，政党政治的客观现实必然衍生出政党治理的现实需要。党内滋生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乃至制度问题，仅从一般层面推进廉政建设并不足以构成其全部内容，而且“现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还不能很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制度供给侧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等，因此，学科化研究要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自身制度合成、制度培育和制度改革。

**二、对几种全面从严治党思路和理念的评析**

全面从严治党被确立为我国四大发展战略之一以来，法规政令密集出台，从工作作风、公款支出、经费使用、廉洁自律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通过不断出台、整合和融合建立普遍性的理性规范，大大丰富细化了从严治党的方式、渠道和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实践逻辑。理论界和学术界概括为党纪处理、德治教育、监察查处和创新模式等四种思路，现从学科教育视角简要做以评析。

1.党纪处理思路。在政党的思想建设当中,腐败对党的思想有着极强的破坏作用,破坏党内政治生态,腐蚀党员理想信仰,损害党的执政威信,造成党的执政资源逐步流失。近年来制定修订100余部党内法规，从规章制度着手规范党的执政行为。只要完善机制、高效执纪、精准问责,就能有效避免腐败现象。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党纪处理能够有震慑和教育成效，不断完善考核问责约束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的预防职能、纠偏职能、惩处职能和保护职能，就能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功效。这一思路认为，制度对权力的规训是根本性的，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注重负面清单的作用，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个内在统一体，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德治教育思路。这一思路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通过建立领导机制、联动机制、渗透机制、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实践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强调国家的行为力量的巨大作用。这一思路多见于教育及宣传部门的学者当中，在近年来出台的党内法规和党员学习教育的措施和办法中比较常见。对于这种思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强调党员干部“内省”，而有学者认为，德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高境界等等，这一思路在充分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着重强调的是各级党委主导和党员领导干部认同这两个要素。

3.监察查处思路。这一思路认为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腐败，权力支配型的社会机制决定了监察的制度基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全面从严治党所体现的时代性、先进性及人类性价值所在。由于人是现实的存在者，强调正当利益是必要的，反对抽象地谈论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主张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出发，强调法治的巨大作用。由于制度的运行具有刚性的特征，主张用监察法等法律进行惩处和规范，把严的主基调贯穿始终，通过实践让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获得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通的东西。

4.创新模式思路。这种思路认为，党内法规是我们党的发明创造，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法治新范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研究成果开始爆发式增长，但热闹非凡的研究表象难掩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全面从严治党要不断增强制度的适用性，做到制度遵循从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到平等的沟通、交流的转变。同时多个单项运行良好的制度并不一定会形成一个良性运行的制度群，这种思路强调制度建设与改进创新结合，避免党内法规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两张皮”现象，制度之间的协同和配套，高度关切制度的“溢出效益”。

相对而言，这四种思路从理论的逻辑自洽与一致方面都是较为成熟的理论思路，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完美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之中去总会或多或少出现实际效果的缺失。就党纪处理思路而言，由于它把处理对象放在党内，致使大量非党人员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监察处理思路虽然突出其法律的基础地位，却忽视党员领导干部精神世界自身的发展规律；德治思路虽然较为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若不从内心认同还是价值不大；创新模式思路认为只要改变方法、内容等就能达到目的，这种思路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系统施治是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效前提，治理效能提升是系统施治的必然结果。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异化。全面从严治党是“多主体”“组合拳”，对权力加强监督制约不能是“单拳种”“独角戏”。在当前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和多变的情况下，理论界和学术界从廉政教育、学科建设、未来人才培养的角度，从以道德制约权力出发提出了以下4种用学科理论进行建构的思路，最终实现以制度制约权力。

1.用廉政学的统摄。廉政学的理论体系以廉政制度为逻辑起点，以廉政建设为核心范畴。包括从整体性和具体性的廉政制度与廉政活动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所有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廉政学的学科体系是一个包括从整体性和具体性的廉政制度与廉政活动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所有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廉政学涵于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它教育有利于培养政治上的“明白人”、忠诚于党的“老实人”。

2.用监督学的统摄。监督学以国家与政党权利结构为主体，探讨公共权力与国家制度、政党制度等监督理论、监督实践及其规律。监督学在知识层面上是和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跨领域交叉性强的学科体系，是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统一；用它来统摄吻合党和国家权力结构的改革方向和配置原则，符合当下学科建设状况和学科发展规律；用它来教育有利于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内在一致。

3.用党内法规学的统摄。党内法规学应该包括本体论、价值论、制度论和运行论四大部分。党内法规学具备科学的概念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方法体系，从各个角度阐释和论证党内法规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围绕着党内法规的概念、属性、范畴以及与国法的关系形成科学的良规体系，用它教学有利于培养遵循良规硬约束的领导干部。

4.用国家监察学统摄。国家监察学涵盖国家监察学及其原理、国家监察制度及其发展、国家监察机关及其人员、国家监察职责及权限、国家监察程序及其监督监察业务中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它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法规学，和法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监察法学理论法治反腐和标本兼治两大理念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用它进行教育既有利于培养监察官后备人才，也有利于提高现有监察官群体的专业能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纪律性规范为抓手，逐步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理论体系。当前党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放在党的长期执政中加以谋划部署，从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整套的制度中选择“纪检”“监察”作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它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用它能够厘清其知识体系。因为“纪检监察”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能够对倡导廉洁、消除腐败等社会现象具有特殊作用。2021年12月教育部《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发布，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版学科专业目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发布，纪检监察学科成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正式有“学”的名分，最终取代各类称呼而被普遍接受，标志着用“纪检监察学”统摄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已尘埃落定。通过纪检监察学科化使领导干部谨慎用权、规范用权、依法用权，严守抵腐定力，带头弘扬清风正气，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觉。

**三、用学科化整合与重构全面从严治党方法**

制度建设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严峻形势，唯有运用制度的力量才能形成治理合力。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心问题在理论上体现为“制”，在实践上体现为“治”，即制度与治理。“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规范社会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设计思路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合二为一根本路径，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人们行为不确定性而增加确定性。从学科上来讲它是一个综合系统，是依规治党的具体表现，体现了科学性和规范性。一方面“制”是“治”的依据，各个具体方法有自己的生成逻辑与构成要件、结构特征与施治内容，治理方法与独特贡献，近年来在一些新颁、修订的国家法律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怎样全面适当履行职责作出对应的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惩戒性规范等规定，在新时代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实践中，也彰显出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党纪国法一体建设的制度导向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治”是“制”的实现，治理能力是党的制度在贯彻落实中的主体化、应用化。制度本身是中性的，实际运行却会出现好与坏两种结果；再好的制度也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同时制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直处于变迁中。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制度是不完美的，因而制度或规则可以分成优、劣和过时三种。

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逃出固有的思维方式，“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制度的需求就会有制度的发展和改革。以制度引导方向，解决思想根源问题，遵循根治建设规律。2018 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兴起，各领域各层次各位阶党内法规次第推出，与此同时，中国式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不断形成。从学科角度创立和完善制度理论，促进形成制定法规制度的科学体系。一方面搞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使人们遇到问题时有致思理路，通过严密逻辑论证“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合理方式与途径，新旧治理方式的较量就是一场发展观念革命，“全面”“从严”“认同”是同一定发展观念结合在一起的，通过“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首先，从治党的发展视阈看，制度建设要与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形势在节奏上的基本一致和吻合。立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挖掘不同组合方式的类型、程度、特点，以高质量立规来构建体系，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治理方法，统筹推进各环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及时把比较成熟普遍适用的经验做法提炼为制度规定，转化为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制度的治本作用。一是把制度规范和界定功能具体化，从可适用于追责惩戒的制度层面定义违纪的各种情形，从而有利于靶向精准识别；由于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和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常常会为制度所吸收，转化为成熟定型的制度，当前要整体梳理各种方法的历史背景、治理阶段、治理效能及与我国政治发展总体形势，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分析。二是把制度强制和惩戒流程优化再造，建立案件处理优质高效便捷的闭环系统，对适用主体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适度的、公正的惩罚，对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做到正确运用方法和精确整治。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会产生对制度强烈的国内需求时期。制度是通过变迁而不断完善的，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我国法规制度是在反复试错和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理性成果，制度的形成主要依靠社会组织行为目标的确定化，多开展富有成效的创建活动。三是用制度激励和引导使党内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法规化，拧紧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精心预防各种违反制度的行为发生。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建构意义和根性价值的人类社会基本规范，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成果和基石，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文明在党政治理和社会进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基础性工程、战略性任务，要做好常态化开展，制度导向是靶向整治化推进，在思想理论上要体现“制度文明”。在治理过程中，分工和职责不同，主体和对象具体，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边界日益明显，呈现出四种处理类型。党纪、国法、监察、德治是同一个层面的方法和类型，可以进行科学分类；四种方法单一运用及有机整合衔接，形成2种、3种及4种横向组合和要素对接，更加凸显组合治理方法的政治属性和功能。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四种方法在各自领域内展开的特点、各自专属的规范依据与治党的终极和理想目标独立且兼容，又不是一种均质的融贯，而是有组成程度上的差异。从主体、对象、治理依据和效果等核心要素，探寻它们的要件、以相应的要素组合和协同效果更好。如纪律成为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凭借后，党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的党内法规制度，但散见于报刊杂志、文件、领导讲话和单行本等，理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实际，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坐标、自己的主心骨，履行新时代的新使命，尽快编撰纪检监察学体系教程。教程要全面反映从严治党，说理透彻，通过学科化的教育，让大家严守纪律定力，把党章党规党纪印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从小事抓起，不从小处“破纪”“越规”，这样既可以影响、带动和保障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避免法规制度被“锁在抽屉里”，又便于党员群众能够参与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防止法规制度“封闭运行”。从程度上来分析，以监察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党纪为核心、以德治为基准的当前多种组合类型中，各种方法组合的优点、实施条件，总结衔接协同规律。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和“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并列，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总要求之一，刹住歪风邪气、攻克顽瘴痼疾，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四种方法按照类型和程度会形成多种复合因素，组合成12大类治理方式、48种治理的具体情形，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阶段、各环节的方法、手段、要素等协调配合并取得最大效能。要通过监督检查问责追责倒逼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落实，对有规不依执规不严的必须严肃查处，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全面从严治党既解决思想根源问题，又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纪法分开后面临着纪法衔接问题、同样面临纪纪衔接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党领导的国家治理要实现发展与治理的良性互动。从治理来看，治理体系的结构、联系、规则、运作等是由政党制度性质决定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的制度理论越来越成为治理关键性、深层次、文明性因素。《纪律处分条例》与《监察法》表明要从点和面对组合运用四种治理方法的效果进行客观和主观评估，分析“合格型”“优秀型”的达标水平或者底线水平、要件的组成等，不同区域和领域选择全面从严治党方法和类型要考量的经济社会状况、自身免疫力、外部风险和挑战等，要坚决制止制度建设中搞制度摆设、制度形象工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制度安排的利弊得失、制度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对比情况研究透，不断优化政治生态来积极推动其蕴含的价值优势、体系优势和运行优势，确保每项党内法规制度都立得住打得通管得了，要坚持制定和实施一体，推进统筹制度改革与制度运行，保证改革成果落地见效，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陈欢系西安培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丁士美与廉政文化

包卫兵 程兰芳 徐培华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https://baike.so.com/doc/10003519-10351346.html" \t "_blank)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https://baike.so.com/doc/4757664-4973166.html" \t "_blank)，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灿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老百姓心目中影响最为深广者当首推孔子，其次就要数到包拯、丁士美等。近期通过学习《宏略良方——丁士美殿试策论》《明状元丁士美的特殊贡献》《状元丁士美的成才之路》《丁士美与中华瑰宝《永乐大典》》系列资料，收益很多，笔者认为反腐倡廉教育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当前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丁士美廉政文化思想的启蒙**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开好局、起好步来展开。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丁士美，字邦彦，号后溪。1521年农历三月初七出生在明朝淮安府清河县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状元，三朝大臣（嘉靖、隆庆、万历），两代帝师。历任：翰林院修撰，经筵官，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日讲官，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东宫侍班官，兼教习庶吉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曾任会试同考官、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武举会试主考官、会试知贡举官、殿试读卷官等。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恪”，赐祭葬。丁士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重录主要分校官之一；是《明穆宗实录》编纂副总裁；是《经筵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等经筵书籍的主要作者之一；另有诗文传世。

明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己未科殿试在紫禁城皇宫举行。明《皇明历科状元录》、《状元图考》等史书记载：考试之后，读卷官把成绩排名和前十名卷子一起呈给皇帝审阅。原本选出的第一名并非丁士美，但嘉靖帝（明世宗）看了卷子以后并不满意。当看到丁士美卷子，眼睛就一亮，见开头就写道：“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底德业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后可以尽代理之责。”深惬帝衷，用玉管笔朱圈“君臣交儆”、“人臣自靖”八字，置于卷首。就这样，丁士美成为状元。当时嘉靖皇帝的策问是这样的：“朕恭承上天明命，君此华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与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见以我心而是体百务，惟欺君以欺天，害民亦害物，彼尝言之者后尽背而弃之。夫大学之道，专以用人理财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理，财得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责，岂独我能耶？兹欲闻人得用，财得理，以至治羙刑平，华尊夷遁，久安之计，何道可臻，尔多士其言之，必尽所怀焉！”（《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

《御书堂丁氏族谱》收录了丁士美的殿试策论。他用三千多字阐述了自己的论点。在策论的一开头，他就画龙点睛地说道：“臣闻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底德业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后可以尽代理之责。”这几句在写作方法上叫做“破题”。破题十分重要。在科举考试中，它往往决定能否胜人一筹，因为考试官必定着重先看破题是否得当和优美。丁士美的“破题”“破”得相当有水平，用简洁数语将皇帝出的难题给解开了。令人叫绝的是，在论述君臣关系时，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个“儆”字，即告诉世人：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告诫、相互砥砺，帝王德业才可望有所成，人臣才会安宁做事，随之大家也会尽到分司代理天下之责。

贪猛于毒。笔者认为，今天的各级党员干部不论身处何位，都不能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不能与国家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成为人民的罪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决不能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为了一己私利而作出违反党的原则和违背做人品德的事情，牢牢记住大大的“廉”字，这个字如同一棵茁壮成长的苗木，必将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随时自觉抵御各种腐败的侵袭。

多年来，有件让笔者记忆犹新的事：毛泽东反腐只说四个字。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次杀掉的两名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周恩来当时将这两人贪污的情况报告上交给毛泽东并请示意见，毛泽东对这两个人的案子统共只说了四个字，有人问怎么办，毛泽东说“死刑”，接着有人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又是两个字“不准”。所以，要有一批人去办反腐倡廉这件事，也就是说要有一批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带头反腐倡廉，才能凑效。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治国经验不能废止，今天仍然值得全党治国安邦进行借鉴。大力弘扬丁士美以德为先、以廉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文化，对于当今[反腐倡廉](http://fanfu.people.com.cn/" \t "_blank)、勤政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源清流自洁，心正行必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的作风建设抓得紧、抓得好，人民群众就支持拥护，党的事业就发展顺利一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思维，总结党的作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使党经受革命性锻造，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务必不断打扫和洗涤自己的思想，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我们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干事，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履行职责，廉洁勤政为民，做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干部。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

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反腐倡廉贵在久久为功。历史是一面“明镜”，它映出的是中国人民千百年不变的执着追求。建党100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严厉整治“四风”，根本目的也是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仅仅止步于防止“四风”反弹回潮是不够的。必须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以好作风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今天，丁士美为学、为官、为人都堪称楷模。明清两代记载及传说对丁士美无不赞誉有加，丁士美所处的明朝中期向晚期的转折阶段，形成“隆万盛世”、“万历中兴”，其中有丁士美的特殊作用。丁士美身上体现出的砥砺向上的奋斗意志、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公正刚直的廉洁风范、勤勉务实的敬业态度、敬谨谦恭的人格修养、睦亲齐家的家风传承、为国为民的良臣品质……，这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思想，打造特色鲜明的运河文化，建设勤政廉洁的干部队伍，传扬励志尚学的教育风气，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风尚，均具有鲜明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丁士美与明代廉政制度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清廉。务实，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https://baike.so.com/doc/110027-116096.html" \t "_blank)建设中执政党廉洁从政的规律，坚持立党为公，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务求工作实效。为民，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清廉，就是保持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廉洁奉公，廉洁从政。

廉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西周初年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六廉考核实施体系：“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http://www.guoxuedashi.com/a/1445c/" \t "_blank)·天官·小宰》）。到了[秦朝](http://www.guoxuedashi.com/lishi/66839b/" \t "_blank)，进一步明确为“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到了明代，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发展到顶峰。

[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把《大明律》和《大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列为[科举](http://www.guoxuedashi.com/lishi/44245z/" \t "_blank)考试内容，就连农村最基层的单位里也要“置塾师教之”。在[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的倡导下，《大诰》风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另外，[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还规定每县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戒。[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还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在中央，[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为正二品衙门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在地方，[朱元璋](http://www.guoxuedashi.com/renwu/41775r/" \t "_blank)建立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不仅如此，明朝还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的百姓而言，完全打破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传统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

丁士美为官刚直不阿,主张对内抑制宦戚专权，选任贤能；对外严修武备，精选将才；强调立法对国有利，于民无害，反对法令随意变更，主张务德慎利，赏罚明正，丁士美执法严格，铁面无私，敢摧权贵，其人格魅力和司法实践为后世广为称颂，颂扬甚多。

万历二年（1574），万历皇帝御书“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予经常为小皇帝授课的丁士美。“责难陈善”出自《孟子·离娄上》：“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大意是说：大臣应当勉励王做难做却是有益的事情，向君王陈述有益的言辞以规避歪门邪道，这才是臣下对君王的“恭敬”之道，不然，一味的为君王没有做善事的能力为其开脱，纵容君主胡作非为，这就是奸佞、坏人。

丁士美勤奋上进、才高学厚，纯厚正直、公正不阿，忧时愤事、敢于进谏，廉洁奉公、勤政为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形端表正、忠孝两全。为学、为官、为人，丁士美都堪称楷模。丁士美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1、教化皇帝，培养太子。隆庆、万历两朝，丁士美都是经筵讲官，尤其是日讲官，为皇帝和太子讲经释史，是实际意义的两代帝师。尤其是万历帝继位时年仅十岁，主要靠张居正、丁士美的教导。《丁士美墓志铭》中记载：“每进御前，必以正言格论，反覆开道。古今之治乱，君德之成败，人才之进退，风俗之盛衰，莫不凿然可指。上为耸听嘉纳。”2、编纂书籍，重录“大典”。 丁士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最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重录主要分校官之一；是《明穆宗实录》编纂副总裁；《经筵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等都是根据经筵日讲稿编纂的重要书籍，丁士美是主要作者；《明实录》及《明史》等重要史书，都是在丁士美等经筵官日讲官所记载基础上完成的。3、培养、选拔、管理人才。丁士美不论是做翰林学士，还是做国学主官，都言传身教、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丁士美曾九次担任乡试、会试、殿试的考试官，还担任过吏部侍郎，做了很多中央层面的培养、选拔、管理人才（官员）的大事。他选拔出的文武人才，得到各方面肯定。4、管理全国文化、教育等工作。丁士美做过国子监、太常寺、礼部负责人。隆万时期及明朝后期文化教育艺术非常兴旺，科举制度完备发展，《本草纲目》等名著纷纷面世……，其中丁士美发挥了默默无闻的重要作用。5、严格吏治，促进改革。丁士美当过几个部门负责人，最后参与管理全国官员。丁士美殿试时所作的策论，就针对当时恶劣的吏治环境，提出“去三浮，汰三盈，审三计”改革弊政的治国良策。做官后，丁士美身体力行，整肃吏治，规范朝纲，促进对严嵩乱政的消除，推动“隆万大改革”。丁士美处在明朝中晚期转折阶段，形成史称的“隆万盛世”、“万历中兴”，其中有着丁士美的特殊作用。不论是官方正史，还是半官方史料、民间传说等，明清两代对丁士美无不赞誉有加、不吝颂扬之辞。为学当如丁士美，文魁才高志不移；为官当如丁士美，勤政廉洁力务实；为人当如丁士美，形端表正忠孝齐。丁士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代表了“君臣交儆、人臣自靖”的良好吏治环境，也代表了文人官宦的优秀形象，代表了中华民族众多的优秀传统品德，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追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反腐倡廉既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学习领会丁士美与廉政文化，是普及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学习先进人物，歌颂纪检战线刘丽英、曹克明、姜瑞峰、王歧山等无数当代廉政典型的过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庄严承诺。“老虎”“苍蝇”一起打，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铲除腐败的坚定决心，“老虎”“苍蝇”一起打，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要彻底改变以往反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越反越腐的尴尬局面。**打“老虎”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虎”们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势力，政治背景相当复杂。要打“老虎”，必须有不怕自己“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勇气，必须有“抬着棺材上阵”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能在全国人民面前这样庄严承诺“老虎”“苍蝇”一起打，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决心有多大。“老虎”不打，不会主动降伏；“苍蝇”不打，也不会自行消亡。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应当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坚持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才能坚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信念，才能获得整体推进的形式与力量，才能减少防治腐败中可能出现的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才能克服反腐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满足或懈怠，不断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就清明的政治风气和健康的政治生态。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的谈话用语生动活泼，引用民众常用来互相嘲笑的“缺钙”，透露其贴近民间与务实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的每一次讲话都没有大话、套话，“责任”、“人民”成了高频率的词语，其中的反腐声音尤为引人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致辞，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提出了更高要求。500年前，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清官丁士美的故事勉励了无数后人。500年后，还是在这片土地上，作为丁士美家乡的后人，我们要赓续前行，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开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篇章。

**三、赓续丁士美治国安民的勤廉思想**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政、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根据欧阳修的《廉耻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也就是说清廉是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明朝的郭允礼撰写《官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最为后世称道的经典阐释，对中华廉洁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宝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恒久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自豪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的同时，应积极萃取古代公廉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

丁士美作为明朝嘉靖年间状元，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学识出众，任两代帝师。参与《永乐大典》重录襄较，掌管过礼部和吏部，为国家选拔人才发展文化教育。丁士美生在淮安，葬在淮安，在离大运河不远的南京，考中举人、走向仕途，在大运河北端的北京做官十八年……他一生都在大运河沿线。不论正史，还是民间传说，对丁士美都是充满赞誉和颂扬。

嘉靖三十八年，丁士美的策论用三千多字阐述自己的观点。整篇文章观点鲜明，思考深入，语言精到，一气呵成。针对策问，丁士美提出“去三浮，汰三盈，审三计”的方略。“三浮”是指：官浮于冗员、禄浮于冗食、用浮于冗费；“三盈”是指：赏盈于太滥、俗盈于太侈、利盈于太趋；“三计”指：有不终岁之计为下也，有数岁之计为中也，有万世之计乃为上也。殿试后考官审卷，并排列出名次，将成绩名单和前十名卷子一起呈给皇帝审阅。《皇明历科状元录》、《状元图考》等史书记载了丁士美被擢为状元的原因：先是卷进呈，其第一已有所拟，皇上览之弗当意。览及士美卷，见其策起云：“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底德业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后可以尽代理之责。”深惬帝衷，用玉管笔朱圈“君臣交儆”、“人臣自靖”八字，置于卷首。通过丁士美状元策论可以看出：丁士美是身在书房、心怀天下的大才，与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形成鲜明对照。相对于混乱腐朽的朝廷风气，丁士美就像一股清泉。可以说，嘉靖帝不仅发现擢定一个状元，更是得到晚年整治朝政的一剂良方，获得再塑政德的信心。

丁士美中状元后，即任翰林院修撰，走上仕途，开始十八年的京官朝官生涯，为大明国家发展做出了特殊重要贡献。丁士美的成才源于三点：一是“诗书继业、忠厚传家”的家庭教育；二是勤学博览、矢志不渝的个人努力；三是激励上进、求贤为国的科举制度。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很多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周永康、郭伯雄、郑筱萸、赖小民**、赵正永**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世人触目惊心。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既坚定果断刹风整纪，加大办案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又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注重深化改革，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源头治理，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不断以反腐倡廉实际成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各级纪委监委要坚决贯彻党中央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期盼，在党委领导下认真履职尽责，持续紧盯惠民政策落实和扶贫、民生领域腐败、黑恶势力“保护伞”等，加大监督检查和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人具体事抓起，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共权力要放在阳光下运行。当然，古代“以民为本”中的“民”，是相对于统治者的“官”而言的，体现了“官本位”桎梏中的优秀文化；今天“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人，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古代的“以民为本”与今天的“以人为本”性质不同，但古代“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丁士美“以民为本”的思想文化和勤政为民的功绩，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大力弘扬。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今天弘扬 “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回顾历史，我们豪情万丈；展望未来，我们心潮澎湃。习近平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建设廉洁社会文化，促进社会成员遵纪守法，建设廉洁政治文化，促进从政人员务实清廉，建设廉洁组织文化，促进全体公民明礼诚信，建设廉洁职业文化，促进从业人员爱岗敬业，在全社会营造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氛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导和教育广大职工群众积极的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中去，以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己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争做贡献。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为官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回溯历史滔滔之江河，泥沙漉尽，终熠熠而生辉者，独高洁之士不负于清廉。其品正者，言行守正，不求不实之名，不取不义之财，不染不良之风，不为不法之便。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这些应该是我们所崇尚的。全党上下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十九届五次全会部署，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一以贯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和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切实把正风肃纪反腐各项任务一抓到底、落地见效，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风清气正好扬帆，廉洁照亮新征程。2021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中央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都八九年了，一方面对增量腐败坚决零容忍，另一方面对存量腐败只要揭露出来了也是零容忍。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增量腐败、存量腐败都是零容忍，字字千钧。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反腐败一系列新数据新信息，再次警示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警示各级领导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心明，如一缕阳光透彻心扉；行廉，如一袭清风拂去尘埃。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全党全社会廉洁价值理念进一步树立。同时要看到，同全面从严治党新任务新要求相比，廉洁文化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不重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思想根基不牢，抵制腐败思想自觉不强，甚至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必须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已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结合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整理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组织开展我国反腐倡廉历史研究，把握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历史昭示未来，沧桑成就正道。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今的中国大地，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鼓舞下，站在民族复兴与崛起的风口浪尖，立在中国梦跨越赶超的历史新起点，树立全新的反腐倡廉理念，着力打造“制度反腐、制度防腐”的新格局，荡涤群众周边的腐败丑恶现象，警钟常鸣，让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服务于民、惠及于民。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让我们弘扬丁士美廉政精神文化，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坚守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情怀，在正风肃纪反腐上坚定不移、一往无前，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卫士”“战士”。

（作者包卫兵系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阴分局，经济管理专业；作者程兰芳系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王家营街道老干部党支部，行政管理专业；作者徐培华系江苏省淮安市淮阴中等专业学校，经济管理专业。）

基于文化空间适宜性的西安“三河一山”

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刘世栋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全党全社会廉洁价值理念进一步树立。但同全面从严治党新任务新要求相比，廉洁文化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为此，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必须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进行整体推进。

廉洁文化建设不能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建设，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廉洁文化的氛围。通过弘扬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为此，在传统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有必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传播廉洁文化，同时丰富廉洁文化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并拓展利用廉洁文化资源，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新格局和新思路。

**一、西安廉洁文化建设现状与评价**

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在近年来廉洁文化建设中，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在廉政教育基地建设方面，围绕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综合政治类等主题，西安市各区县建立廉政教育基地30余处，党史教育基地22处，极大地丰富了西安市廉政教育的展现平台。

2020年由西安市纪委牵头建设的西安市警示教育基地正式建成开放。教育基地内以“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为主题，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主线，通过多元化的表达方式，统领廉洁文化建设主旋律。自警示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受到市纪委、各级党组织以及群众的广泛关注，成为西安市廉洁文化的新标杆。

由此可见，党员及群众对于廉洁文化是有较高的接受度的，但必须通过现代化的表达手段和丰富的展示空间，形象、生动的表达廉洁文化的内涵。同时廉洁文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党风廉政建设，更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家风文化、红色文化、甚至能够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纳入其中，形成群众基础扎实、社会关注度高、党员学习兴趣浓的多元廉洁文化学习平台。

**二、西安“三河一山”建设背景及存在问题**

**（一）西安“三河一山”建设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21年西安市“三河一山”绿道205公里主线全部贯通，74公里核心段绿道实现无障碍贯通。“三河一山”建设是落实绿色发展、建设生态西安的重要举措，是提升西安城市建设品质，增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加强突出历史文化魅力，打造美好城市生活的重要工程。

**（二）西安“三河一山”文化展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河一山”绿道建成以来，虽然由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专门的运营公司（西安山河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但在文化保护和展示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1.**沿途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效果不佳

“三河一山”绿道沿途遗存非常丰富，但目前以文保单位为主的抢救性保护方式无法全面有效地保护和发挥文化遗产价值。“三河一山”绿道2公里辐射范围内，包含约50处不同等级的文保单位，很多文保单位实行孤立保护，与市民互动差，还有大量寺庙、古桥、古堰、民居等不可移动文物尚未被市民和游客了解。另外，“三河一山”绿道沿线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与自然山水联系非常紧密。目前，沿途文化遗产解说和展示系统缺失，市民和游客无法系统而完整地了解沿途文化遗产内涵，以及文化遗产与山水环境的关系。

**2.**文化展示内容少，形式单一

“三河一山”绿道工程由驿站、绿道、城市公园（功能性片区）组成，其建设初期的功能主要是为游客提供康体休闲、健身娱乐的场所。但是随着市民对城市文化、生态文化、休闲娱乐以及其他更多形式的文化内容需求日益增多，“三河一山”文化展示的功能性缺失弊端日益凸显。许多市民在游览“三河一山”的驿站、绿道以及功能性片区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能够体现西安特色城市魅力、城市文明以及文化内涵的产品。但现有的“三河一山”绿道工程内，除介绍绿道建设内容外，场所均按照商户租赁的形式进行日常经营，对于文化的展示内容少，且只有广告牌、宣传栏这类静态展示方式。

综上所述，西安“三河一山”作为西安市重要的城市文化展示平台，其具有优质的展示空间和文化挖掘潜力。结合西安市廉政文化在展示方式、展示空间、展示内容方面所需要的突破与创新，围绕西安“三河一山”的驿站、绿道以及城市公园，可以充分将生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以及家风文化等内容，有机植入“三河一山”的物理空间内，运用新媒体技术、把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统筹各类媒体资源，积极传播廉洁理念，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统筹廉洁文化阵地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建设质量，丰富廉洁文化展陈，更好发挥教化功能，最终实现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最终目标。

基于上述廉洁文化的建设诉求，本文首先从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角度，分析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其次围绕“生态文化与廉洁文化”融合的思路，探索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路径。

**三、西安“三河一山”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

目前西安的城市社会、自然、人文资源已经形成了“南山北水”的城市格局，“三河一山”绿道在现有城市格局下，极大的扩充了城市的文化空间。但是就目前西安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状来看，文化资源的展示方式、展示空间以及文化受众对西安文化资源的敏感性、感知度以及接受度都尚不理想。尤其是廉洁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内容，许多市民表示愿意接受，但对于形式、内容以及展现方式上，需要有进一步创新。为了更好的了解普通受众对廉洁文化、生态文化等文化内容的接受度，本文就目前已经建设完成的“三河一山”空间资源（驿站、绿道、城市公园）进行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评价，以期寻找到廉洁文化、生态文化合适的展示空间和展示方式。

**（一）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构建**

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评价模型构建，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空间载体中文化场景对与文化资源的表达形式、文化资源设施完善程度、文化受众对文化表达形式的接受度以及其空间是否还有更深的开发潜力等方面进行的综合性评价。本文选择设施完善度、文化展现方式、市民满意程度以及空间开发潜力四个基本概念，以“三河一山”绿道中驿站、廊道和功能片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驿站进行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评价，以期通过这项评价工作，寻找目前“三河一山”文化建设的短板，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思路。

本文结合目前国内外较为成熟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创造性的提出有关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结合AHP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评价模型的目标层、因子层、指标层和权重。如表1所示，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分为4个目标层，14个因子层以及18个评价指标，并根据德尔菲法确定了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该评价指标体系，本项目可以对“三河一山”绿道的所有节点（驿站）、绿道、功能片区（城市公园）进行文化适宜性空间评价。

研究对象选择目前已经建成的一级驿站、重要廊道以及城市运动公园作为评价对象，先横向对比各驿站的文化空间适宜性，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统计与打分，在满意度方面采取访谈的形式进行现场得分统计，最终确立目前“三河一山”已建成驿站的文化空间适宜性。

**表1 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指标体系**

|  |  |  |  |
| --- | --- | --- | --- |
| 目标层 | 因子层 | 评价指标 | 权重 |
| A设施完善程度 | A1交通便捷度 | A11停车位数量 | 0.02 |
| A12自行车摆放点数量 | 0.03 |
| A2公共卫生设施 | A21公共厕所数量 | 0.03 |
| A3休息空间 | A31休憩空间面积 | 0.07 |
| A4餐饮服务 | A41餐饮服务商家数量 | 0.06 |
| A5运动场地 | A51休闲运动场地数量 | 0.04 |
| B文化展现方式 | B1文化展示数量 | B11宣传品数量 | 0.1 |
| B12文化展板数量 | 0.1 |
| B13文创产品数量 | 0.1 |
| B2文化展示质量 | B21文化展示种类 | 0.05 |
| B22是否有生态文化展示 | 0.05 |
| B23是否有廉洁文化展示 | 0.05 |
| C市民满意度 | C1服务质量满意度 | C11服务质量满意度指数 | 0.05 |
| C2文化展示满意度 | C21文化展示满意度指数 | 0.05 |
| C3服务设施满意度 | C31服务设施满意度指数 | 0.05 |
| C4商品质量满意度 | C41商品质量满意度指数 | 0.05 |
| D空间开发潜力 | D1周边可开发地块 | D11可开发地块面积 | 0.05 |
| D2室内可利用场景 | D21室内可开发面积 | 0.03 |
| D3周边可利用展示墙体 | D31可展示墙体面积 | 0.02 |

**（二）西安“三河一山”文化空间适宜性分析**

**1.**西安“三河一山”驿站文化空间适宜性分析

如图1所示，将目前已经建成的10个主要1级驿站进行了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评价。由图1可以看出，目前市民认可度最高，空间适宜性最佳的驿站分别是太乙驿（92分）、灞桥驿（86分）和奥体驿（82分），空间适宜性较差的驿站为滋水驿（56分）、鸣犊驿（64分）和库峪驿（66分）。

**图1 “三河一山”驿站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结果**

通过对“三河一山”驿站的空间适宜性评价可以发现，目前驿站建设较好的太乙驿、灞桥驿、奥体驿在未来可以具有较好的文化展示潜力。其他驿站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文化内涵等方式，提高其自身的文化适宜性。

目前驿站文化展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展示墙、展板以及文化书店等方式进行文化传递。根据现场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驿站的文化宣传品极度匮乏，室内外宣传墙几乎没有宣传“三河一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内容。许多驿站至多在驿站门口摆放“三河一山”规划概念图，也没有对驿站的主题有过多的宣传。宣传品方面也多是曲江文化旅游集团出版的一些具有普适性地方特色的读物。即使是评价得分最高的太乙驿和灞桥驿，其文化的表达多是与旅游、休闲、娱乐消费有关，很少涉及“三河一山”的生态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内容。

**2.**西安“三河一山”绿道文化空间适宜性分析

“三河一山”绿道按照线状分布，可归纳为：灞河-浐河都市滨水绿道、渭河郊野滨水绿道、沣河-潏河-滈河自然滨水绿道、秦岭山塬沿山绿道。这四条绿道围绕西安城市，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闭环。

如图2所示，四条绿道的文化空间适宜性得分为：灞河-浐河都市滨水绿道（88）、渭河郊野滨水绿道（91）、沣河-潏河-滈河自然滨水绿道（87）、秦岭山塬沿山绿道（84）。

**图2 “三河一山”绿道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

“三河一山”在项目建设时，其功能性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市民消费者户外运动、休闲锻炼的需要，在景观设计、道路设计以及标识设计时，没有过多的考虑文化的挖掘，因此在绿道文化展现这个方面，整体偏弱。

相比较而言，渭河郊野滨水绿道文化建设内容较多，主要涉及渭河滨河保护，项目生态文化建设介绍等内容。反观应该可以做出更有生态内涵的秦岭山塬沿山绿道，其没有过多的体现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也为下一步“三河一山”文化挖掘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围绕“秦岭违建”事件进行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开发方向。

**3.**西安“三河一山”功能片区文化空间适宜性分析

西安“三河一山”绿道项目的主体是绿道和驿站建设，但是根据“三河一山”总体规划的要求，将绿道和节点驿站所连接的区域进行归纳，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片区：奥体广场片区、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秦岭大终南山旅游景区、渭河生态公园片区、沣镐城市滨河公园片区。这个五个片区涵盖了“三河一山”沿线的所有重要资源集聚区域。

如图3所示，“三河一山”的功能片区文化空间适宜性分析评价得分分别为：奥体广场片区（93分）、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97分）、秦岭大终南山旅游景区（84分）、渭河生态公园片区（88分）、沣镐城市滨河公园片区（87分）。文化空间适宜性最高的为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

**图3 西安“三河一山”功能片区文化空间适宜性评价**

“三河一山”功能片区目前是城市文化展现的主要区域。但是由于目前西安城市总体文化展现主要集中在商业街区，对于以自然生态、康体休闲为主体的城市运动公园、旅游景区以及运动广场，这些区域的文化展现主要集中在城市潮流文化、城市运动文化以及城市旅游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展现内容，还停留在科普、宣传的阶段，形式单一、内容死板、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局限性较大，而对于广义范围内的廉洁文化，更是鲜有涉及。

评价得分最高的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97分），其得分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地处曲江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其唐文化景观和标志性地物整体拉动了雁鸣湖周边的文化内涵，其文化展现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和主题性。为此其他片区的文化展示必须要走特色化、主题化的方向，同时在文化表达的内容，形式上，一定把握我国文化宣传的主旋律，在内容上进行创造，在形式上进行突破，在表达上进行创新。

综上所述，“三河一山”未来的建设重点是以绿道为串联，以驿站节点为补充，重点打造五个功能片区的文化品牌。将功能片区的文化品牌作为挖掘重点，将功能片区之间的连接绿道作为文化传递的纽带，将绿道上不同等级的驿站作为文化内涵提升的亮点。通过这样“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可以将生态文化、廉洁文化有机的融入到现有的空间场景中，不仅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文化体验，也可以探索西安生态文明与廉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三河一山”文化空间廉洁文化建设的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一）西安廉洁文化建设的需求分析**

西安“三河一山”作为西安重要的绿色休憩空间，目前能够承载的活动非常丰富。但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发现，西安市“三河一山”整体运营只能保持基本的商业活动，在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建设方面，很难展现出城市特色和文化特色。

西安目前的廉洁文化建设多围绕党员廉政建设、廉政纪律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方面，但是对非党员以及普通市民的宣传教育工作，相对比较薄弱。同时廉洁文化与城市建设文化、生态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脱节。但通过调研发现，市民对廉洁文化并不排斥，也愿意通过各种宣传资料、宣传平台接受廉洁文化建设的洗礼。

一方面在我们廉政建设的供给层面，需要有更加广阔的廉洁文化展示平台，同时需要将廉洁文化更加亲民化、更加“接地气”、更加能够让党内外人士将廉洁文化学习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需求层面，市民和党员干部也希望能够对廉洁文化的学习更加多元化，学习内容、学习场景和学习活动更加丰富。

基于上述分析，将“三河一山”的驿站室内空间、绿道沿线以及功能片区的室外空间，选择适当的区域进行廉洁文化展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西安“三河一山”文化空间的适宜性评价，目前“三河一山”文化空间开发潜力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但是其功能性较为局限，主要体现在城市运动、康体休闲以及度假旅游等方面。在文化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廉洁文化建设等凸显城市文化建设的内容方面，没有进行专门规划、设计和挖掘。

具有较高开发潜力的节点驿站是太乙驿、灞桥驿和奥体驿，驿站内基础设施完善，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和人流量，比较适合在现阶段植入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休闲文化、廉洁文化等为主题的文创主题产品、文化宣传展台、雕塑群以及文化主题活动。

具有较高开发潜力的绿道是渭河和浐河滨河绿道。这两条绿道由于地处浐灞生态区和渭河湿地保护区等区域，其主题特色明显，绿道周边的生态文化具有较高的辨识性，并且渭河和浐河沿线的文化资源也较为丰富，能够较好的将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和廉洁文化做到紧密结合。

具有较高开发潜力的功能片区是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该片区地处曲江生态示范区，其内文化主题以唐文化为特点，景观塑造方面具有较高的主题性，同时在生态文化方面，曲江本身优质的城市生态环境，也为该片区展现城市风貌，凸显城市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河一山”的廉洁文化建设具有较高的可行性，走“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发展建设理念，并将传统的廉洁文化内容与生态、历史文化有机结合，通过内涵建设和适度的硬件改造提升，实现“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的目标。

**五、西安“三河一山”生态文化与廉洁文化融合发展建设**

**（一）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1.**建设廉洁文化与党建活动的新空间

依托“三河一山”优质空间载体，将廉洁文化引入驿站、绿道和功能片区的展示空间内，尤其是针对目前驿站文化展示缺失的问题，在发展驿站商业文化的同时，将西安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就、廉洁文化内涵以及党建内容有机的融入到驿站的文化建设中。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历史文化与传统家风文化有机融合，同时为党建活动提供更加丰富的活动空间。

**2.**呈现多彩自然的生态廊道

依托绿道规划建设，保护修复沿途生态，展现山清水秀的绿色基底和麦浪金黄的关中丰饶土地。构建大西安生态骨架，展示山、水、塬、田、城相互交融的城市格局，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3.**体验古都山水文化的遗产廊道

“三河一山”要充分发掘历史文化遗产内涵，萃取古运河文化、古驿道文化、都城文化、关中乡土文化、宗教文化等特色文化精华，通过绿道有机连接沿线文化遗产点，对不可移动文物、古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自然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利用和展示，让遗产走进生活。

**4.**展现美好生活的幸福廊道

通过整合沿线游憩资源，植入文创、体育、休闲和旅游元素，激发绿道活力。让市民和游客望山亲水、赏花游城、品味生活、诗意栖居。与周边功能区联动发展，扩展市民与城市交互的空间，提升城市宜居性和舒适度，提升市民幸福感。

**(二)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目标**

1.廉洁文化建设目标：拓展西安廉洁文化教育新空间

依托绿道建设，在“三河一山”范围提供新型休闲场所，开展以廉洁文化展示、警示教育宣传、优秀廉政作品巡展等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为人们在休闲空间中提供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内容。积极创新文化体验形式，制作更加符合大众审美和接受度的宣传教育短片，在“三河一山”驿站空间打造廉洁文化体验空间，在绿道沿线设计规划廉洁文化长廊，在城市公园、运动公园等功能片区以雕塑、巡展等方式拓展廉洁文化展示平台，积极拓展西安廉洁文化教育新空间。

2.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完善城乡生态空间，构建生态文明展示平台

借助绿道构建合理的城乡空间格局，增强城乡联系。大西安空间结构中，“三河一山”绿道是大西安核心区的生态隔离廊道和生态发展带。“三河一山”秦岭绿道是秦岭生态文化带中距离核心区最近、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渭河绿道是渭河生态文化景观带的城市精品段，灞河绿道和沣河绿道分别作为国际开放轴和科技创新轴的重要生态廊道。“三河一山”将生态、文化和旅游融合，其目的就是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让西安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有的放矢，形成生态基础设施网络，遏制城市无序蔓延，形成自然与城市融合的山水文化空间。

3.城市文化目标：保护和展现西安山水文化

“三河一山”绿道是理解西安“山-水-城”文化脉络的重要载体，通过绿道规划，梳理“山-水-城”完整的文化脉络，突破现行行政边界，从山水城一体化的视角进行整体保护。聚焦“三河一山”绿道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发挥历史资源具有的国际性优势，将山水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呈现完整的西安城市历史发展脉络，成为彰显华夏文明的窗口。

**（三）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体系构建**

1.物质层面

“三河一山”是西安的资源聚集地，除生物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之外，还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人文资源。因此，需要进一步做好以“驿站、绿道、城市公园”为“点-线-面”结合的文化挖掘和展示工作，在合理范围内，设景观小品、口袋公园等多种展现形式，以向更多的人展示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廉洁文化和生态文化。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平台作用，利用VR、AR等技术，通过短视频等多种形式，为市民和游客展示和介绍“三河一山”环线绿道建设中各区域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向游客展示西安的特色。

“三河一山”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在秦岭北麓。秦岭北麓（西安段）目前的廉洁文化建设，必须要借助最具有代表性，同时最具有开发价值的项目作为依托，同时将秦岭违建事件作为西安廉洁文化建设的突破口。构建“三河一山”廉洁文化体系时，在物质层面，按照现有西安秦岭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围绕“三河一山”的驿站、绿道和城市公园，将廉洁文化与生态文化、旅游文化有机结合，发展具有较高接受度的廉洁文化展示平台。

2.精神层面

以秦岭生态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体系，突出廉洁文化建设的广泛性。紧抓大秦岭地理中心、生态中心和人文中心的生态文化理念。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时刻将陕西秦岭，尤其是在开发西安生态文化旅游产品时，围绕秦岭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诠释和设计。在将地缘文化、珍稀动植物、生物群落及相关生态系统信息、生物多样性信息等，通过廉洁文化展示平台向外展示，丰富廉洁文化在普适性，提高民众接受程度，以更加灵活多变的产品形式，传达给市民群众，以达到通过秦岭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廉洁文化建设的目的。

3.行为层面

从秦岭北麓（西安段）在践行生态文明和廉洁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行为层面看，主要是通过设计和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廉洁文化体验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将生态观光、生态度假等旅游产品包含在内，还包括科普研学、文创设计、康养度假等符合当下旅游市场需求的产品，更要紧紧围绕西安廉政建设的内容，将党史学习教育、廉洁文化学习、立德立行等传统廉政思想融入其中，围绕“三河一山”以及秦岭北麓周边优质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城郊公园，打造符合秦岭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并且能够积极传递城市廉政建设水平的产品体系。

4.价值层面

“三河一山”廉洁文化体系构建中，主要丰富西安“三河一山”廉洁文化的精神价值。围绕秦岭山水文化和廉洁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充分展示西安人民在贯彻落实秦岭违建事件的处理办法、西安城市建设、西安历史文化方面的工作，也充分展示西安廉政建设在展示方式和展示空间方面做出的努力。

**六、西安“三河一山”生态文化与廉洁文化建设路径**

在探索基于“三河一山”文化空间的廉洁文化与生态文化融合建设的路径时，本文主要从生态绿色空间与廉洁文化空间的优化与叠加方面入手：

**（一）驿站空间的优化**

1.驿站内部空间的文化要素提升。“三河一山”驿站内部空间的文化要素提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现有驿站空间内廉洁文化主题的凝练。重点将一级和二级驿站的文化展示功能进行升级改造。以驿站名称、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典故、周边水系、森林或山地资源的生态特色以及周边已经成熟的人文古迹、旅游景点或城市公园为展示内容，植入具有时代特色和城市特色的廉洁文化内容和红色文化内容，加强驿站的文化主题凝练。

二是驿站红色文化产品的多元化打造。在驿站商品销售区，加强红色文化类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产品不局限于文化书籍或文创产品，需要引入更加多元化的文化体验产品，如VR、AR数字展示产品或数字藏品，凸显西安城市红色文化底蕴。

三是驿站内部设计风格完善提升。在不破坏“三河一山”驿站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在内部墙绘、内部展板以及服务项目上，以一级驿站带动周边2-3个二级或三级驿站，形成廉洁文化、红色文化主题群，重点讲好西安红色文化、廉洁文化和绿色文化故事。

2.驿站外部空间的文化要素提升。主要突出廉洁文化与绿色文化的有机结合。让“红色”与“绿色”故事有机结合，在不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前提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红色”廉洁文化塑造。将党史学习教育、廉洁文化学习、红色革命故事以及学习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等内容，以科普宣传的方式，在“三河一山”驿站空间、绿道沿线以及城市公园中进行展示。

二是“绿色”生态文化的展示提升。重点围绕“三河一山”各水系以及秦岭本身的文化内涵，将文化内容通过建筑外立面展板、涂鸦、雕塑以及数字媒体技术等展示方式的突破，将驿站的文化宣传功能释放到最大。

**（二）绿道空间的优化**

西安“三河一山”绿道的空间优化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绿道沿线展示空间的提升与修缮，打造文化主题长廊。文化主题长廊的内容要结合绿道沿线各驿站的文化主题和资源特色，如：

灞河-浐河都市滨水绿道：突出浐灞生态区湿地生态特色和灞桥文化遗址的历史故事；

渭河郊野滨水绿道：突出渭河郊野生态风貌和渭河水文化的特色；

沣河-潏河-滈河自然滨水绿道：突出沣、潏、滈水系文化和周文化遗址及历史典故；

秦岭山塬沿山绿道：突出秦岭山地文化和秦岭违建事件反思的廉洁文化。

**（三）功能片区的优化**

功能片区的生态功能性较高，但是目前展示的方式过于单一，多采用展板、广告牌等形式进行生态理念的阐述，缺乏互动性。为此功能片区（包括城市公园、旅游景区、人文古迹）在绿色生态文化与红色廉洁文化的空间叠加方面，必须要将功能片区作为文化展示的场景，在满足消费者基本的休闲、旅游需要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本身所在区域的山水文化内涵，并植入优质红色文化内容。如：

奥体广场片区：凸显城市运动、休闲、康体文化的同时，必须要将西安城市生态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融入当中，同时适当的将红色文化、廉洁文化、家风文化进行展示；

雁鸣湖郊野公园片区：围绕雁鸣湖、曲江池、大唐不夜城打造城市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同时，将雁鸣湖生态治理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当中；

秦岭大终南山旅游景区：重点突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丰富旅游景区的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体验项目，重点将秦岭违建警示教育基地、秦岭和谐公园的建设内容通过活动产品设计，与景区有机融合；

渭河生态公园片区：渭河生态公园片区在渭河滨水驿站、廊道的贯通下，重点将渭河流域的水文化作为生态文化提升的重点方向；

丰镐城市滨河公园片区：丰镐城市滨河公园片区在体现城市休闲运动的同时，将丰镐二京的周文化、丰镐河道的周文化重点以数字藏品的形式，在公园片区进行展示。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传统廉洁文化研究很少在展示方式上进行深入思考。廉洁文化、党建文化、红色文化这些文化建设内容，基本上都偏向严肃的教育话题。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市民对于廉洁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党员学习教育层面，很难走进大众的文化视野。

优秀的廉洁文化其受众不能局限于党员干部，更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认知。为此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利用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西安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优质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有机的与廉洁文化、红色文化融合。为西安廉洁文化建设、红色文化挖掘、生态文化产品设计以及文化体验产品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也可为今后更加科学的挖掘“三河一山”文化内涵，拓展文化产品，培育文化产业提供更加系统理论基础。

西安市纪委在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中一直强调，要“创新传播载体手段，积极运用社交媒体、移动客户端等传播平台，实现广泛覆盖和有效覆盖”，丰富链接文化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拓展利用廉洁文化资源。为此本文研究对标西安市纪委在拓展利用廉洁文化资源方面的需求，积极为廉洁文化建设寻找新的文化阵地和展示空间，依托西安“三河一山”优质历史文化名胜，丰富链接文化展陈，更好的发挥教化功能，力争打造一批具有浓郁廉洁文化特色的“山水驿站”、“绿色长廊”和“红色文化公园”。

（作者刘世栋系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